

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探析

张晋宏¹, 李景平²

(1.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2.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党内政治文化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源自于遏制党内庸俗腐朽政治文化滋长蔓延的现实关怀,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理论中国化的时代进程,遵循了坚持文化强国与文化兴党有机统一的执政规律,彰显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鲜明特色。习近平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视角明确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政治意识属性,集中体现为:“讲政治、重民心”的政治意识、“理想明确、信仰坚定”的精神追求、“平等参与、忠诚服从”的组织观念、“联系群众、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人人平等、坚守底线”的纪律观念、“有规必依、执规必严”的制度意识。为此,习近平要求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在党的政治实践中坚持唤醒党内政治文化自觉,培育党内政治文化自信与实现党内政治文化自强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政治生活;马克思主义政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文化兴党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21)02-0024-1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习近平敏锐地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切入点。针对当前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突出问题,他创新性地提出“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1]181}的重大命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又进一步将“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2]20}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明晰了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之间的内在关联,规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党性特质,确立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积极健康的导向。这些重要论断既阐明了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意蕴和基本内涵,也指明了其未来的发展要求和方向,由此形成了内涵丰富、全面系统的党内政治文化观,并寓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之中。

与此相应,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学术话语阐释与建构成为理论热点。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探讨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辨析、生成来源、品质特征、维度构成、价值功能、现实挑战与建设路径等,较少关注对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的系统论述与学理分析。同时已有研究虽然在整体上体现出注重对党内政治文化学术话语进行本土化建构的理论自觉,但在具体研究路径中仍存在一种习惯于“从阿尔蒙德和维巴那里去找根据、求解释”^[3]的思维定式,容易陷入以简单模仿西方政治学话语中的政治文化概念来解读党内政治文化的认识误区。实质上,“党内政治文化概念是习

收稿日期:2019-03-21

作者简介:张晋宏,法学博士,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长安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官员‘不作为’治理研究”(17AZZ014),项目负责人:李景平。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新概念和新范畴”^[3],这规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尤其是以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为科学指引。因此,理清、归纳、总结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的时代背景、核心理念与践行要求,对于科学建构党内政治文化学术话语体系、全面提升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目标性和科学性、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一、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结晶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4]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命题从首次提出到明确为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5],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纳入新时代党建总体布局并最终以党章形式予以确立,这一历程清晰地刻画出了习近平思考如何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助推全面从严治党提质增效的思想轨迹。由此形成的党内政治文化观,既有现实上的深切关照,又有理论上的战略考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与中国特色政党实践相统一的结晶。

(一)遏制党内庸俗腐朽政治文化的滋长蔓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同向发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使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在总体上呈现良好态势。但同时,“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四个不纯”日趋呈现复杂性、尖锐性和严峻性,并将根本症结直指党内政治生活中更具深层次和机理性的问题和矛盾。这集中体现为:在当前跨文化交流交融和多元社会思潮纷繁激荡的背景下,封建残余文化、错误社会思潮、西方价值崇拜^[6]、围绕市场经济沉渣泛起的腐朽思想、求稳怕乱的心理偏差等庸俗腐朽政治文化,愈加以一种驳杂交织和隐蔽渗透的方式对党的政治肌体进行侵蚀,从而威胁着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质量与进程。

究其根源在于,其一:庸俗腐朽政治文化具有影响上的深层性。实质上,一些不良政治文化由来已久,之所以根深蒂固难以铲除与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不无关系。如中国传统深厚的官本位、人情观、等级观、面子观^[7]等文化惯性,以及社会转型催生的多元价值理念等,都长期和潜在地冲击甚至塑造着一些党员干部的心理结构和行为取向。如若理想信念不够坚定便极易失去思想阵地,触碰底线和逾越红线。而最为危险的是“两面人”现象,其特征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在同一人身上互为表里”^[8],这种言行不一的伪装性使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愈加难以准确和及时识别,从而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党内政治生态净化造成极大冲击。其二,庸俗腐朽政治文化具有内容上的杂糅性。当前党内不良政治文化主要包括:封建专制遗留的“官场术”“厚黑学”“潜规则”等文化余毒,它们错误运用商品交换原则于党内政治生活,从而催生了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病态心理,以及盲目崇拜西方价值观产生的极端个人主义、推崇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错误思想。这些庸俗腐朽政治文化并非单独作用于个体心理,而往往是以叠加之态使其侵蚀力度大为增强。这从一些落马官员具有多重违纪违法行为的定性中便可佐证。其三,庸俗腐朽政治文化具有蔓延上的顽固性。党内不良政治文化虽然会依照其自身逻辑沿固定轨迹蔓延于党内政治生活之中,但在全面从严治党高压下却常常通过乔装改扮隐形黏附于新制度中。如形式主义借助“互联网+政务”的科技外壳使“痕迹管理”异化为“指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入新元素变种出“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能推则推、能躲就躲”“不贪不占也不干”^[9],贪污腐败通过电子商务或物流快递隔空操作、拉帮结派隐匿于微信群等。此类改头换面或潜入地下的不良政治文化恰恰验证了其自身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也使一些党员干部更难以准确辨清和裁量尺度,从根本上加剧了解决这些顽疾的艰巨性。

概言之,庸俗腐朽政治文化具有的深层性、杂糅性和顽固性等特征决定了对其必须采取根本性举措加以规制,要求同向提升制度的震慑力与文化的滋养力,将以律正人和以文化人两种方式有机结合。因此,在当前党内法规日臻完善的同时也必然要求党内政治文化协同并举。而以价值引领、人文滋养和柔性约束为主要方式直抵党员干部政治心理的党内政治文化一经有效建构便会发挥持久性、渗透性和稳定性的积极作用。因此,习近平正是基于党内庸俗腐朽政治文化积弊难除且新痼泛起这一紧迫问题导向下提出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大命题。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理论中国化的时代进程

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中并未直接有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系统性阐述,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注重在建党治党理论与实践,通过对各种敌对理论和错误思潮进行批判而向全世界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目的和意图^{[10]30}。如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等予以严厉批判,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正是基于立场的坚定性、理论的科学性、实践的革命性和成员的纯洁性而使党成为无产阶级中最先进和最坚决的部分^{[10]44}。虽然其笔下的“先锋队”指代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国际工人阶级组织等不同主体,但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定性则是明确的。并指出“先锋队”就是始终起先导、领导和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先锋”并非永久不变。列宁则在创建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实践中、在对“经济派”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等的无情批驳中提出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先进部队”的完整论述,但强调必须要名副其实,做到“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11]。为此,在思想上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精神武器,从中取得一切信念,确定斗争方式和活动方式^[12];在实践上必须实行严密组织形式和遵守严格组织纪律。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从历史价值与本质属性相统一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加以定性的,由此形成的这些重要论述构成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源流,并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持续探索党内政治文化发展以及保持党的先进性提供科学指引。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建设视为一项系统工程来部署,坚持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根本依据来制定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路线与党建布局。党内政治文化正是在党持续深化和拓展党建布局的实践中淬炼的结晶,并在自身内涵得到不断丰富时持续推动着党的建设的良性发展。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创造性提出思想建党,延安时期形成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三位一体”的党建总体布局,奠定了治标与治本、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党建总基调,也搭建起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最初架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党的建设更加注重在广度与深度上持续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开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进程,并将制度治党纳入党建范畴,从而为党内政治文化注入制度内涵和提供制度支撑。随后,党的十三大报告全新提出“从严治党”重要命题,继而开启党的建设新征程^[13]。面对新世纪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工作重点^[14],党的十七大报告针对腐败问题对党的严重侵蚀又进一步全新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并要求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形成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建新布局^[15]。党的十八大报告又将党的纯洁性建设新增为党的建设主线的重要内容^[16]。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着眼于党执政的长期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在对党建总体布局的系统谋划中突出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并全新提出纪律建设,以及重点强调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48}。概言之,中国共产党将党内政治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始终内置于治标向治本转变、始终勇于自我革命的治党逻辑中,使其从思想建设范畴中的一个隐形命题上升至辐射党建总范畴的显性命题,并成

为党在新时代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不竭精神动力,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理论中国化的新征程。

(三)坚持文化强国与文化兴党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以工人阶级的国家取而代之的政治斗争视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任务,同时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坚持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并发挥其核心、领导作用。这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并建构社会主义国家和领导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长为中国全面开启现代化及进行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了中心支柱和领导核心作用,在此政治实践中又生成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旨在治国”^[17]的独特政治逻辑。步入新时代,习近平将治国理政与党的建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深刻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处于决定性地位,而推进伟大工程必须结合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实践来进行。可以说,如何有效地把治国与治党有机统一起来并使二者相辅相成是新时代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国家与民族的兴衰和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理念。党作为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导者,必须首先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坚定党内政治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层面治国与治党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完成新时代文化使命的题中之义。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因此,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18]党要完成新时代文化使命,如若连自身内部蔓延的庸俗腐朽政治文化都难以遏制,何谈加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领导。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而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治国必先治党的执政规律决定了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自信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32}。而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在建党治党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融合创新的结果。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在坚持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因等层面具有共通性。这不仅使二者紧密相关,也使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充分体现党性的文化而成为“最能够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文化形态之一”^[19]。由此,光明坦荡、清正廉洁、实事求是等兼具政治性、思想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党内政治文化,既给予中国共产党自信以充实理由和底气,成为构建良好党群干群关系的思想纽带。社会民众通过对党内政治文化的高度认可延伸至对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定自信。可见,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的生成体现出遵循治国与治党有机统一规律的逻辑必然性。

二、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的核心理念

习近平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辩证关系的视角揭示了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政治生活的紧密联系,明确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政治意识属性,且集中体现为忠诚老实、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既形成于也体现于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的全过程,同时也使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了与西方政治文化完全不同的丰富内涵。

(一)“讲政治、重民心”的政治意识

政治意识体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政治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

的性质,并要求国家要对人民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以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他腐朽思想。这从国家根本法高度提出了公民政治意识培育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党的先锋队性质,并明确指出“讲政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是党员干部的必备基本条件。这从党内最根本法规高度提出了党员增强政治意识的严格要求。可见,政治意识既是党和国家性质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党中央纪法衔接、纪严于法的执政理念。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因此,能否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始终是无产阶级政党夺取和维护政权的先决条件^{[20]302-303}。这要求党必须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质,即坚持彻底的批判精神、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明确的历史使命。而党内政治文化正是基于此构成了党的独特精神标识,同时也规定了政治意识在其自身结构中的统领与核心地位。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员干部政治意识是否牢固直接决定着党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与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中能否团结一致和方向正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敏锐察觉到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交互错杂,深刻指出一些严重腐败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问题,强调领导干部在政治上出现问题对党造成的危害丝毫不亚于腐败问题。因此,“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21]。为此,党中央专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要求必须将党员干部政治意识的培养和锤炼作为党性修养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党员干部一要对政治本身有正确认识,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对照、改造和提升自己;二要始终坚定政治信仰、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牢记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谨记民心向背的执政规律;三要把提升政治能力置于所有能力之首,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以强化政治担当;四要牢固树立政治规矩意识以掌握工作主动性。总之,党员干部政治意识的培育需主动作为和持续续航才能不断消除政治虚无主义倾向的思想空间,从而锻造具有党性的党内政治文化。

(二)“理想明确、信仰坚定”的精神追求

精神追求体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先进性。“一种政治文化的形态如何,关键在于支撑其骨骼的价值系统如何,其中的价值核心居决定作用。”^[22]党内政治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于一体,经过实践淬炼最终积淀而成的一种社会政治意识,在结构上体现出历时性与时时性的统一,并构筑起自身多维价值系统。马克思主义基于代表阶级的先进性与革命性、对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创新、对社会理想及政治理想的明确与坚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和文化成果的总结与继承。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党内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统领与核心,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根基。这不仅使党内政治文化在获得坚实现实基础的同时在理论高度上达致了最高基点,也赋予其理论指导、理想激励和人才培养等丰富功能,从而最终使党内政治文化彰显出区别于其他政党文化的先进性。

党员干部是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集生产者 and 承受者于一体,其在政治活动中能否形成代表本阶级利益的价值观直接决定着党内政治文化先进性的维系与发展。建党百年来,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始终是党保持先进性和团结统一的根本基石和基本经验。党在历次集中教育活动中都明确将思想教育置于首位,由此能在不同阶段涤荡掉诸多错误思潮并孕育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严肃指出党内政治生活之所以出现诸多问题,根源在于一些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这一“总开关”最先出问题,这也是习近平将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思想建设首要任务的缘由所在。质言之,理想信念既是党的性质与先进程度的体现,也是党员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的指引。为此,习近平要求党员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必修课,并始终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

和政治灵魂”^{[23]312},且以此作为保持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尤其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将思想建党视为根本任务更是彰显出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方向的深刻考量和高度文化自觉与自信。

(三)“平等参与、忠诚服从”的组织观念

组织观念体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凝聚性。政党作为阶级的组织,在围绕国家政权进行的政治实践中能否依据阶级性质和环境要求恰当地确立起一定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直接关乎自身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强弱。列宁更是将组织视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武器^{[24]158},要求党员必须参加党组织,并确立起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于肩负实现国家独立富强和人民自由解放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否具有高度组织性至为重要。对此,习近平要求在实践中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构筑起从中央到基层坚强严密的组织体系以保障党的力量凝聚、地位独立和行动统一;在思想上形塑起以忠诚老实、艰苦奋斗、任人唯贤等价值观为核心的党内政治文化,为保证党员干部心中有党和团结一致提供内在精神动力。

民主集中制是为防止党内权力过于集中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而建立的根本组织原则,这构成了党员组织观念的基本内核。一方面,坚持党内民主要求党在政治实践中必须依靠集体智慧,要求党组织和具体组织制度都必须体现民主。为此,必须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增强党员主体意识,使平等参与、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等成为党员组织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求党内全体成员必须自觉自愿服从党的一切决议、维护党的权威、对党忠诚,以保证党将一切力量汇聚于一点。为此,团结和谐、忠诚老实、奉献担当等成为党员干部必备的精神品质。关照现实,习近平多次严肃批评当前党内依然存在独断专行、对党不忠诚、“两面人”等问题,并明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把强化组织观念作为必修课和基本政治品质,要时刻谨记党员身份、义务和责任,“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政治上依靠、工作上服从、感情上信赖组织”^[25],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具体要求党员干部在工作实践中,既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证令行禁止,也要将组织观念落实到岗位和行动上,在贯彻和执行党中央决策时“不打任何折扣、不要任何小聪明、不搞任何小动作”^{[2]83}。

(四)“联系群众、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

务实作风体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实践性。从认识论视角看,党内政治文化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有机统一,既是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理论凝结,也指导着党组织及党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必须首先将自身铸造成一支具有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政党组织,保证全体党员团结一致、激发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为此,党从成立伊始便注重作风建设,并历经多次整风整党运动而确立起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优良作风,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可以说,党的作风就是党组织及其成员外化于行的整体精神风貌和行事风格,代表党的形象和彰显党的人格力量,是人民群众认知和评价党的最直接可感知的对象。这也是习近平将党的作风提升至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生死存亡的高度所在。

透视当前党内政治生活,“四风”问题依然存在并逐渐隐蔽变异。对此,习近平告诫全党作风问题就是腐败的温床,要深刻认识到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并于首次当选总书记后便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直击腐败积弊。一方面,将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核心。早在浙江工作时期,习近平就提出“群众呼声是作风建设的第一信号,能否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生产生活问题是检验作风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26]263}。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和走群众路线,从人民中汲取智慧,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另一方面,将解决问题和务求实效作

为关键。为此,连续开展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实践,在广度上涵盖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全方位问题,在深度上注重思想理论的持续“补钙”,在方式上注重以“领导干部”为重点和坚持“抓常、抓细、抓长”^{[23]319}。这既是习近平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生动实践,也是对新形势下作风建设的时代考量。具体要求党员干部:一要在想问题、作决策和办事情全过程中坚持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二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在调研中务求“深、实、细、准、效”^{[26]1};三要克服做表面文章、粗枝大叶等问题,以极大勇气、担当和毅力推进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为党内政治文化保持自身生机与活力提供不竭动力。

(五)“人人平等、坚守底线”的纪律观念

纪律观念体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约束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建和领导无产阶级过程中始终将“铁的纪律”视为战胜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24]245}。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自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严格规定党员行为伊始,到二大通过的党章单列纪律一章,再到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新增“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成为此后历次党章的重要内容^[27],纪律严明已成为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也成为每一位党员的基本义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始终将纪律放在前面,指出党作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在一个“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没有党的团结统一”^{[23]319},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和执政能力也会极大削弱。党的十九大报告则首次将“纪律建设”列为党的建设的一种基本形态,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将各项纪律加以细化,从而为党员干部划定清晰底线。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1]154}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章、党规、党纪、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都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但从近年来查处的一系列违纪违法案件来看,纪律意识缺位或矮化成为逾越党纪法规的直接因素。这从“侥幸”一词成为众多落马官员忏悔书中的高频词汇也可加以佐证^[28],侥幸心理的本质恰是纪律观念的漫漶。由此,习近平强调要在纪律上进一步严起来,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坚持纪法面前没有例外。并特别要求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意识,把党的纪律刻在心上,并“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23]320},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为此,党员干部在工作中,一是必须自觉严格遵守党章,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在遵守、贯彻和维护党章上强化自觉性和责任性,并对严重违反党章规定的行为加以坚决纠正;二是必须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三是必须接受经常性纪律教育,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并以榜样为示范、以案例为教训,将纪律融于自己的日常言行。

(六)“有规必依、执规必严”的制度意识

制度意识体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法治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形态的核心特征。因此,治党与治国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的一体建设性。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以及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统一是习近平制度治党的具体策略。为此,党中央专门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进行系统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注重统筹推进不同位阶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并已基本构筑起涵盖顶层设计与具体举措、制度制定与执行一体的“四梁八柱”党内法规制度体系^[29]。但习近平强调制度贵精不贵多,要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以达致务实管用。为此,党中央开展了两次集中清理工作以保证党内法规与政策的权威性、统一性和有效性。实质上,制度的制定与落实都与“人”这一主体不可分

离,它囊括了制定者、执行者及适用者。而全体党员干部无疑是党内法规制定、执行和适用的最直接主体,其是否形成尊崇、遵守和捍卫制度的自觉意识直接关乎着党内法规的有效落实与否,也影响着全体社会成员制度意识培育之效果。

审视现实,正是部分党员干部藐视、无视、消极执行和选择性执行制度助长了各种潜规则、人身依附关系等非正式制度的蔓延。习近平也曾多次严肃指出当前党内政治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无制度意识、无敬畏之心。对此,习近平明确要求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制度意识,“形成尊崇、遵守和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30]。并进一步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将“强化制度执行力、提高治理能力”规定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31]。但党员干部制度意识的形塑和锻造是一项系统性和长期性工程,要真正达致“不想腐”的目标仍任重道远。为此,习近平要求狠抓制度执行,并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无一例外的根本原则,对令行不止行为坚决惩处。概言之,文化是制度的价值支撑,只有将尊崇、遵守和捍卫制度自觉沉淀于党员干部内心深处,才能将法治性熔铸进党内政治文化的精神内核中,才能使广大党员干部及全体社会成员增强对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自信心。

三、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的践行要求

列宁指出:“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20]111}循此逻辑,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取决于社会存在,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对自身及社会存在状况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而党内政治文化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党的政治实践对先进文化进行能动性选择、建构与创新的结果,这种能动性在新时代充分体现在习近平以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的辩证统一来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逻辑理路中。

(一)在反思与认知中唤醒党内政治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深刻思考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民族文化何去何从时提出的概念,并将其简言之“自知之明”,即“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该文化要明其来历、形成、特色和发展趋向。目的是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获得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2]。换言之,文化自觉内蕴着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现实诉求,是文化主体在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自我与他者交互作用下对既有文化样态的反思、认知与觉醒,并在实践中完成向文化自信和自强的逻辑转向。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通过始终保持高度文化自觉来建设先进党内政治文化,并进一步推动自身发展壮大和完成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要求。建党百年征程中,党在成立伊始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便成为文化自觉之开端,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铸造出共产党人昂扬向上的革命文化和凝结出全体人民精神追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党在历次重要关头作出正确抉择提供了思想文化支撑。因此,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和推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首先唤醒党组织及其成员对这种文化样态的自觉,消除部分党员“日用而不知”或只停留于表面概念的状况。

具体而言,唤醒党员干部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自觉应注重三个层面:一是对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样态独立存在的意识”^[33]。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最有理由自信,核心在于党拥有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因为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软性约束具有极强渗透性和持久性,因此能够成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和形成良好政治生态的价值支撑和精神滋养。而这种对党内政治文化内涵与价值的省思本身便是文化自觉的生动体现。二是对党内政治文化优势或先进

性的清晰把握。这既需要在与域外文化比较中彰显,也需要在与我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比较中深化,以求克服糟粕、吸取精华和实现超越。如习近平所言,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34],因而在真理、道义和实践维度上凸显出相较于其他文化样态的先进性。三是对党内政治文化发展的责任担当意识。这不仅是作为执政党的内在使命,也是抵制不良政治文化侵蚀的现实要求。概言之,党内政治文化自觉涵盖着党组织及其成员对该文化性质、内容、形成、特色及趋势等的全面反思与认知,而这首先是一个理论指向问题,即必须通过理论研究对党内政治文化的丰富内涵加以阐释。为此,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党内政治文化话语体系,并通过有效宣传教育使全体党员明晰并认同党内政治文化。只有在理论上研究清楚、在宣传上叙述清楚,才能真正唤起党组织及其成员的党内政治文化自觉。

(二)在坚守与践行中培育党内政治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在对既有文化反思与认知基础上产生的肯定与认同。与文化自觉作为一种理论认识不同,文化自信内蕴着认知层面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认同,及实践层面的坚定践行与传承发展。唯有实现文化自信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有机统一才能彻底释放出文化更基本、更深沉和更持久的力量。因此,党内政治文化自信就是在对这种文化样态全面反思与认知基础上的高度肯定和认同,尤其是对其优势或先进性的强烈认同。正是基于党内政治文化内蕴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强大真理力量、坚定人民立场的强大道义力量、滋养党的建设的强大实践力量,才给予党内政治文化自信以坚实底气,进而有了“坚持坚守的定力、奋起奋发的勇气和创新创造的活力”^{[23]195},最终为政党自信提供不竭源泉。反之,若对党内政治文化缺乏自信或自信不足,便可能自卑自弃,或全盘他化为其他政党文化;或为庸俗腐朽文化占领头脑提供空间;或自闭排外陷入文化保护主义。但若表现为盲目自信则会妄自尊大,轻视或忽视他者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以致踏上以自我为中心的没落之路。

是以,党内政治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党的政治实践中,通过对这种文化样态的认知与反思,从认知层面的高度自觉上升为认知层面的坚定自信,并最终飞跃为实践层面的文化自信。这是一种植根于党的政治实践的彰显理性的渐进过程。但党内政治文化自信并不具有自然生成属性,而是需要培育的对象。具体而言,一是在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中培育党内政治文化自信。党内政治文化虽然是多种文化样态的融合,但并非混乱无序,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及域外文化进行改造和自主建构的结果。因而,唯有在党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才能牢牢占据主体地位,也唯有在同党内各种庸俗文化、错误思潮的交锋论战中才能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这需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精神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武装,从而为培育党内政治文化自信奠定坚实思想基础。二是在创新党的政治实践中培育党内政治文化自信。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内政治文化对政党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实际表达”^[35],党员干部只有置身其中才能切身感受到该文化样态的存在及其先进性。这要求在制定“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主题党日活动等制度以保证组织生活常态化、规范化的同时,更应通过注重仪式教育、开展党的纪念活动、强化新闻宣传的“接近性”等方式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日常化熏染来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的内化进程。

(三)在独立与创新中实现党内政治文化自强

文化自强,是文化自觉和自信的最终旨归,是指立足实际、依靠自我、突出特色,坚定不移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提升文化生命力、吸引力、竞争力和影响力并最终实现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23]324},要做思想引领者和文化强者。为此,实现

党内政治文化自强,已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兴趣,而成为一种神圣的责任与使命,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及引领世界和平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党内政治文化自强尚面临自觉和自信缺乏或不够导致的动力不足问题,相应理论建构也未形成。但习近平始终将党内政治文化自强作为建设强大政党的深厚支撑,并对如何实现这一根本目标作出了实践谋划。具体而言:首先,独立包容是实现党内政治文化自强的根本方向。党内政治文化是体现党的政治信仰和理想的一套价值观念系统,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反映着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挖掘和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以及发挥党的主导作用,并在自立自主基础上增强党内政治文化与世界其他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的交流互鉴,才能从不同文化样态中借鉴优秀成果而仍保持初心和逐步提升世界影响力。其次,党员领导干部是实现党内政治文化自强的主体力量。习近平多次强调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要求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带头坚定政治理想和立场,发挥引领性、典型性和日常性示范作用。再次,协同发展是实现党内政治文化自强的现实道路。要坚持以共生协同理念处理党内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之关系,既发挥前者引领和改造功能,也增强后者滋养作用。最后,改革创新是实现党内政治文化自强的动力源泉。党内政治文化要保持持久生命力最终需要党内法规制度提供载体和保障。而体制机制障碍的破除和制度的科学设置只有通过持续深化改革才能实现。同时,通过建章立制使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成果及时总结上升为相应规章制度也是实现依规治党的重要推手。此外,守正创新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只有在破解党建难题的问题导向下创新理论内容、传播方式与实践指引方能提升党内政治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四)在党的政治实践中坚持党内政治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的辩证统一

党内政治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既体现着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也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系统把握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党内政治文化自觉是其他二者的基础。倘若没有意识到党内政治文化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文化样态,就谈不上对其与其他文化样态的比较优势或先进性的认知。党内政治文化自信深化着党组织及其成员对该文化样态比较优势的自觉,以及建设该文化样态的自我激励。党内政治文化自强则是唤醒自觉、培育自信的旨归所在。从党内政治文化自觉到自信再到自强的过渡并不具有自然性和易发性,而是具有显著的人为实现性和发展阶段性。这一过程遵循着理论认识与实践变革的辩证逻辑关系。党内政治文化是一种植根且作用于党的政治实践的社会政治意识,党员干部只有置身于党内政治生活才能感悟这种文化样态。因此,在思想层面需要经历由感知存在到认识并认同优势的深化过程,这意味着从党内政治文化自觉上升到自信。在实践层面需要由情感上的认同转化为实践上的践行以及责任使命的担当,这意味着党内政治文化自信获得充分表达,开启了使命指引下的文化自强之路。实质上,这三步两过程的实现需要党组织及其成员首先从理论上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优势、价值及趋势做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也正是研究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的旨趣所在,进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系统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进程。

总之,习近平党内政治文化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生成进路中体现的现实关照与理论考量,指明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独特发展逻辑;在理念阐释中体现的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揭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属性;在践行要求中提出的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越进程,明确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路径。这既形成了区别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建构中国特色党内政治文化学术话语体系的思维进路,也为新时代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促进党建提质增效提供了科学指南。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3] 梅荣政. 党的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和紧迫任务[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9):5-11.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 [5] 中共中央党校举行春季学期开学典礼[N]. 人民日报,2017-03-02(1).
- [6] 仰义方,戴立兴.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逻辑导向与路径选择[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5):104-112.
- [7] 王立峰,潘博.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14.
- [8] 姚桓.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初析[J]. 理论学刊,2018(6):25-31.
- [9] “脸好看”易,“事好办”难[N]. 人民日报,2017-12-15(5).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列宁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0.
- [12]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5.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5.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9.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38.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9.
- [17] 深刻认识治党与治国的有机统一关系[N]. 人民日报,2017-04-07(7).
- [18]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7-02(2).
- [19] 李晓娟. 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四个维度[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5-12.
- [20] 列宁专题文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87.
- [22] 王沪宁. 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3):55-64.
- [23]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 [24]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5]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 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全党努力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N]. 人民日报,2018-07-05(1).
- [26]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7.
- [28] 心存侥幸没有出路[N].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11-11(1).
- [29] 加强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3部党内法规答记者问[N]. 人民日报,2019-09-16(4).
- [30]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238.
- [3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9-11-06(1).
- [32] 费孝通. 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334.
- [33] 马文保,盛晓薇. 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和自信[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94-101.
- [34] 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特色[N].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07-12(7).
- [35] 柴宝勇,黎田. 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关系辨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5):111-119.

责任编辑 高阿蕊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